

李达文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李 达 文 集

第 一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李 达 文 集

第 一 卷

《李达文集》编辑组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25 印张 536,000 字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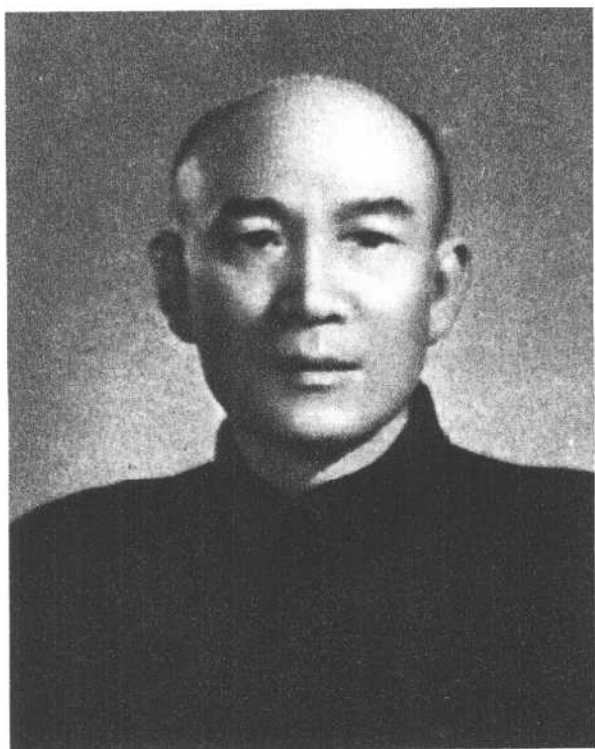
书号 17001·62 定价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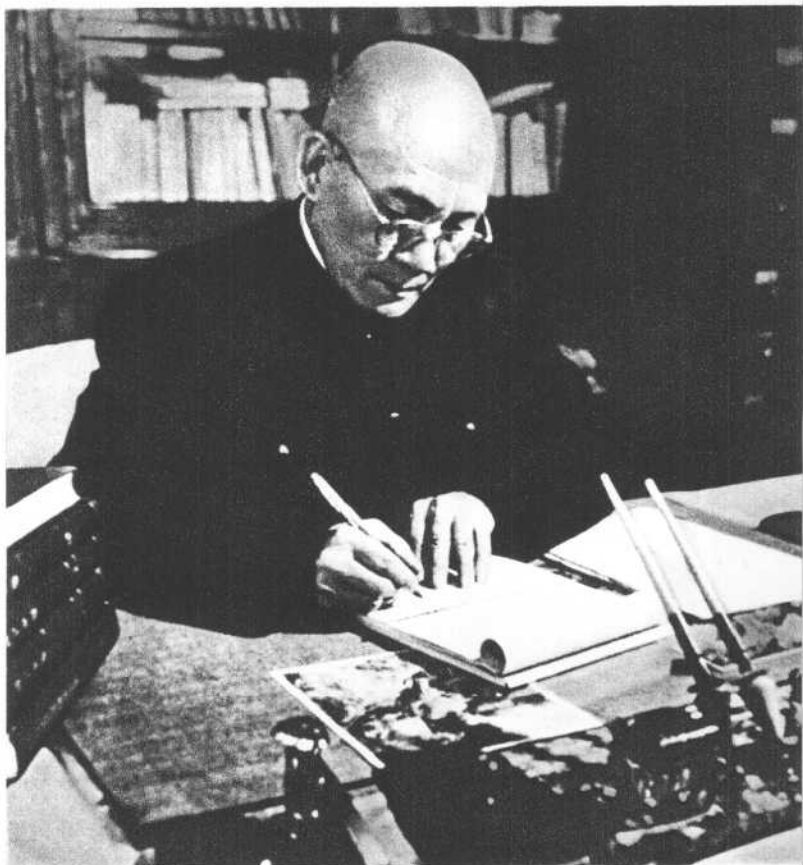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信

要麼自然以維持其生存的动物，是从于物质发生度的
动物。^{（1）}人^{（2）}实践的动物，其能动性，在观念的形式上反映出来，
就成为认识的能动性。而人在认识上反映外界事物的那种
反映，是能动性的反映。那认识的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表
现为主体的创造能力，能够把感觉和印象实际地编理的
加工，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论的認識。认识的这种能动性，
是认识的歷史的實踐的因素。认识的深化运动，也是
在实践的基础上顯現的。在福劳的生產过程中，人们
经常把各种物質的物性和其^{人份}結合，这就促進思
識的分析和綜合的能力，經常看到各种商品互

李达同志著《〈实践论〉解说》的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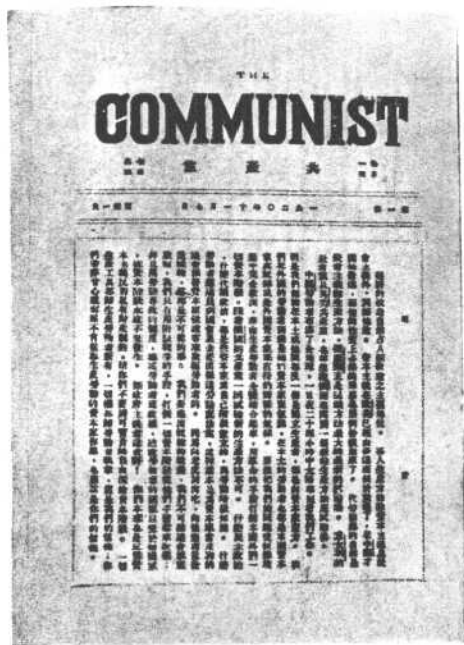
李 达 同 志



李达同志在书房



李达同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



李达同志主编的
《共产党》月刊



湖南自修大学及
李达同志主编的该校
机关刊物《新时代》



李达同志的部分著作

出版说明

一、《李达文集》是为纪念李达同志并保存他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供读者学习和研究而编辑出版的。

二、文集分卷出版。编入第一卷的是作者 1919 年到 1949 年发表于报刊上的部分文章以及《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法理学大纲》等著作和著作的节选。编入第二、三卷的是作者三十年代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专著。编入第四卷的是作者 1949 年后写的重要著作。

三、选入文集的文章按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每篇文章之后注明文章的出处和作者的署名。为保存李达同志著作的原貌，除极个别的文句、错字和标点符号稍有改动外，一律按原来出版的文字排印。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文章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加了少数的题解和注释。李达同志原有的注释，则予以标明。

四、担任本文集编辑工作的是李其驹、陶德麟、熊崇善、段启咸、曾勉之同志。

李达同志生平事略

李达同志号鹤鸣，一八九〇年十月二日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里。一九〇五年他考入零陵的永州中学，一九〇九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他在赴京途中，目睹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到处是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悲愤满腔，立志要学好科学知识，复兴祖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一度感到兴奋。但不久北洋军阀取代了清廷的统治，他极为失望，于是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发奋攻读自然科学。一九一三年，他考上了留日公费生，到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奋起斗争遭到失败，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他痛感“实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但却找不到出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春雷乍响，使他在极端苦闷中看到了光明，产生了对十月革命的热烈向往。

一九一八年四月，留日中国学生得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消息，义愤填膺，集会抗议，遭到军警镇压，决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开展救亡运动。李达是这次回国请愿救国团的带头人。五月回到北京，他立即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许德珩等磋商。经过奔走酝酿，在五月二十一日共同发动了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的运动。这次学生运动遍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地，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预演。斗

争的失败使李达受到深刻的教育，正如他后来回忆的，“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只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①于是他毅然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的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勤奋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同志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把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阅读文献之一）。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之际，他及时地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于六月十八、十九日连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当他得悉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支援营救陈独秀的运动。他还连续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九篇文章，向国内介绍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

一九二〇年夏，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回国。当年春，第三国际代表已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晤谈，提议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回国首先到上海，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接着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为书记。在上海发起

^① 李达：《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载《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组的联系和推动下,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等地也相继筹备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它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建党理论,批判机会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它被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并在革命分子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五千份,实际上成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给蔡和森同志的信)。这个刊物虽然在党的“二大”后停刊了,但它在党成立前后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和组织作用是永垂史册的。李达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办好这个刊物作了极大的努力,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着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

《新青年》杂志自第八卷起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后,李达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

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李达继李汉俊之后,从一九二一年二月起代理书记职务,主持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代表发起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巴黎小组当时与国内联系较少,未通知),他和李汉俊是上海代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大”开幕。当大会会场受到法国巡捕房搜查时,他和他的夫人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

表们转移到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直到大会胜利闭幕。在“一大”上，李达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

一九二一年九月，党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主持。他亲自担任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在一年内，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资本论〉入门》、《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李卜克内西纪念》等书籍十五种。

一九二一年十月，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培养妇运人材，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这所学校是党开展妇运工作的据点，又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场所，由李达兼任校长，他亲自为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他还指导《妇女声》刊物的工作，为这个刊物撰写关于妇女运动的重要文章，该刊许多重要稿件都经他审阅修改。

建党前后，李达以极大的努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与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作了斗争。

建党前夕，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领的研究系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鼓吹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的谬论，主张在中国奖励“开发实业”，“造就”劳动阶级，再实行“社会主义”。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对研究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李达是这场反击战的主将。他发表的《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在击败研究系的反动思潮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还积极参加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占着优势。建党前夕，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易家钺等人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在倾向革命的青年中，甚至在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中造成了

很大的混乱，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思想障碍。李达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发表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就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初步的批判。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及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的荒谬，清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明确地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他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十分注意把无政府主义的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对“理论”彻底批判，对人则尽量争取，他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要约同这些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他的这些文章对于廓清无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促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的觉醒，扫除建党的思想障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在中国建立列宁主义的党，必须划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建党前夕，他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援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详细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比较准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当时我国多数共产主义信仰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不可能系统掌握的条件下，李达的这些论文对于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作用是很显著的。

党的“一大”闭幕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极左派在

柏林成立了“第四国际”，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他们的影响虽然不如第二国际，但我们刚刚成立的党如果不同这股极左思潮划清界限，就有离开列宁主义轨道的危险。李达在第四国际出现仅仅半年以后就写了《评第四国际》一文，就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对待黄色工会问题、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联合农民问题等方面系统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理论和策略。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督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了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这篇论文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他在“一大”以前的思想，表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以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认识水平又有了提高。

建党前后，李达很重视直接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作。为此，他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五一运动》、《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劳动立法运动》等文章。他还非常关心妇女解放运动，除了主持平民女校以外，还以很大的努力研究妇女问题，亲自撰写和译介了大量文章。他撰写的文章有《女子解放论》、《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说明本校（按指平民女校）工作部之内容》、《女权运动史》等；翻译的著作有《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列宁的妇人解放论》、《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女性中心说》、《绅士阀与妇女解放》、《产儿制限论》等。

此外，李达为了驳斥敌人对新生苏维埃俄国的诽谤，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撰写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一文，译述了长达三百七十七页的《劳农俄国研究》的专著，全面地介绍了苏维埃俄国